

人工智能与文学批评

[专题导言]数字媒介经过数载迭代演进不仅形成了媒介技术直接参与故事讲述和意义建构的数智文学创作,形成了非人类主体的人机协作模式,而且使数字人文研究和文学算法分析获得了世界性普及,通过数据建模、文本挖掘、深度分析而创建了传统文学批评难以取代的量化研究,形成了当下数字时代文学生产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本栏目应时代发展之需,推出四篇相关文章,希望能较全面地深度展示数智时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前景。

《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总结了莫莱蒂及其文学实验室的前期工作,指出其成果与不足,以实例展示了机器之所能为与所不能为,指出机器所不能为者或许是当下和未来人文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应倾力研究的客体。《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的叙事伦理》从具体文本出发,从伦理叙事的批评视角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机冲突以及最终和解的路径,以具体的文本叙事分析揭示了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和解决办法。《探寻人工智能文学批评范式:以AI生成小说〈一名作家之死〉为例》以对智能生成小说《一名作家之死》为分析实例,一方面通过戏仿西方经典文学理论“作家之死”的命题,提出在延续传统方法的前提下必须对其加以调适,以适应数智时代全新的批评语境,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激活文学批评和理论的阐释潜能。《〈劳特里奇人工智能与文学手册〉评介》则对人工智能与文学“双向互构”的问题进行了广度和深度兼具的介绍和评论;《手册》从理论建构、实践分析、伦理反思和学科融合四个维度探讨了人工智能对文学总体的影响,为国内大多数人文和文学研究者目前面对的两难处境提供了颇具反思性的选择。

本栏目四篇文章以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全方位地提出、阐释、论述了数智时代文学生产和文学批评面对的各种问题,而结论是相同的:在数字时代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人机协作是必然的存在方式,人类主体必须充分利用机器之所能,同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机器之所不为,这在文学批评领域,则体现为“浅读”“远读”与“深读”“细读”的有机结合。

——陈永国

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

陈永国

(山东协和学院 人文艺术与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9;清华大学 外文系,北京 100084)

摘要: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既要有依据文学算法分析的“远读”,又要有传统形式主义依据文本的“细读”;既要有依赖大数据收集表层资料的“浅读”,又要有基于主体认知和分析能力的“深读”。莫莱蒂与其文学实验室虽为文学量化研究开了先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只依据算法工具,“为”机器所能为,终究未能把数字人文之新与传统人文之“人力”完美结合,故有失偏颇。基于其经验与教训,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就是要将传统的阅读能力与机器阅读的工具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算法分析/量化研究提供的数据,守传统人文研究之正,创批评数字人文之新,将机器之不能为变人力之能为,在语言的边界进行文学的批判性阅读。

作者简介:陈永国,男,山东协和学院人文艺术与教育学院银龄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论及西方翻译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陈永国.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J].外国语文,2026(5):81-95.



本刊微信公众号

关键词:量化研究;文学分析;批判性阅读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081-15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06

0 引言

数字人文和文学算法分析自20世纪中期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技术和理论准备,已经在21世纪初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由人工编写规则转入让机器从数据提取规则的阶段。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在许多领域已呈现取代陈旧理论和批评实践的态势,作为数字人文之一脉的文学算法分析也逐渐为文学批评界所接受,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学批评、尤其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把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应用到文学批评中来^①,去伪存真,创新守正,通过新的实践模式探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可用性,把重心放在数智时代的文学阅读和批评上,处理好传统细读与数字“远读”的关系,进而探讨数字技术给文学带来的“浅读”与“深读”等路径,而这还是要从莫莱蒂和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的文学算法实验谈起。

1 量化之能为

就规模和系统性而言,文学算法分析(algorithm or computational analysis)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当以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为先。莫莱蒂先提出世界文学之猜想与再猜想(2000;2003),发表《表,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2005),继而提出“远读”说(2013),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初具规模。然其“创新”成果就本质而言仍是工具性操作,浮于形式发现,未能达到传统文学批评和理论所期待的深度,所以遭到质疑、反对,乃至诋毁^②。2010年莫莱蒂建立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其初期研究成果遭到学术期刊的拒绝,便始创《手册》(*Pamphlets*),发表实验室不同研究小组的实验和研究结果。据不完全统计,《手册》至今发表17种,另有一篇是与德国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文学实验室合作的参会文章(2025)。其研究主题、应用数据和“实验”成果可按顺序归结如下:

文学网络和情节分析、文学的接受、语义群方法^③、句子和段落层面的风格、操作化、小

① 2020年以后,国内文学研究杂志仅就莫莱蒂算法分析及其“远读”理论的文章,就已发文20余篇。

② 哈罗德·布鲁姆、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斯坦利·费什都曾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质疑数字人文的学术价值,认为这是年轻学者在体制内寻求可能性的一条路径。《远读》发表的同年,江纳生·古德温编辑了《阅读表、图、树:对弗朗哥·莫莱蒂的批评反馈》(2013)。书中汇集文章16篇,除3篇为莫莱蒂自己对反馈的反馈外,其余13篇都是对莫莱蒂“远读”或文学量化分析提出的褒贬不一的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乎:算法分析倚重翻译和二手资料,基于个人偏见,以及某种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

③ 追踪英国19世纪2958部小说中语义场、语义关系、语义形态、语义范畴、语义走向从1786年到1900年的历史嬗变。

说中的音高/量^①、经典与语料库；银行体^②、段落/规模/主题和叙述形式、经典/档案、伦敦的情感。此外，还有电影、图案与解释、绘画（死亡之舞）的算法研究。最后，他们把流行/声望（Popularity/Prestige）作为进入经典的两个模块：流行意味着被许多人阅读，声望意味着中坚分子的赞扬，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文本的“圣化”（consecration）。

作为这些实验之结果的有些发现对于文学批评和理论来说确实是建设性的。如“操作化”就具体涉及现代文学理论中人物空间、词空间、文本空间、悲剧空间等主题，所及作品从古代到现代、从古希腊到英国文学史。对小说中音高/量的研究涉及罗兰·巴特和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关于经典与语料库的研究讨论经典和选集的标准，涉及布尔迪厄的艺术生产理论。关于段落/规模/主题和叙述形式的研究是根据列奥·施皮策在《风格批评》中提出的“细节”和“整体”观，对一百年中的小说语言特征进行微观总结，补充和完善了奥尔巴赫、瓦特和普洛浦等文学理论家在段落层面上对风格的研究。关于经典/档案的分析澄清了出版物、档案、语料库三个概念，涉及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关于伦敦的情感的研究勾画了伦敦的情感地理学，揭示出19世纪进程中真实的伦敦和虚构的伦敦；同时也是一种叙事地理学（Narrative Geography），揭示了叙事两极（前景/背景、故事/话语）不仅主导叙事的时间，也主导叙事的地理。

实验室的算法研究在方法上当然是计算的、量化的、图示的，严重依赖现成的数据和语料库，其序列性准备和调查也纯粹是结构的，其量化结果也因此属于形式研究的范畴，但其思想基础和期待的目标基本上还是后结构主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算法研究的序列性准备和调查看作是纯粹结构的东西（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诺斯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罗兰·巴特的文学风格研究和雅各·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那么，他们调查发现的结果就是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二者间既有相关性和连续性，又有后者对前者的突破和发展；此前的文学批评虽然也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仍未脱离文本批评的窠臼，就单个批评家和著作或整个文学研究而言，依然有严重的同质性、单一性和整一性，而这正是后结构主义和算法批评所要跨越的，以呈现文学研究的多元性、异质性和跨越性。就斯坦福实验室所实践的“远读”来看，这具体体现为把西方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深层的、潜在的、不可视的“关系”（relations）呈现为表层的、显在的、可视的“关联”（correlations），用表、图、树呈现出来。这可以从以下各方面见出：

（1）西方思想史：一与多、总体与部分的关系；

（2）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象征系统：语言中各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比相互间的孤立更

① Loudness：低音、中音、高音的变化，把音量作为量化声音历史的手段。

② BankSpeak：主要研究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由名词和形容词出现的频率推导民族框架内国家主导的经济和金融管理。

重要;

(3) 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符号之间依其关系而非指涉发生作用;

(4) 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谱系学:侧重结构关系的变异、形变和断裂,探讨价值的形成和建构,取代本体论叙事;

(5) 海德格尔的拆解(destruction) 和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取代以文本为核心的分析,固着于文本的偶然性而用图表展示不可见之物(让不可见可见),或表达不可表达之物(让不可表达之物表达);

(6) “操作化”:后结构主义对概念的操作,经常遇到德里达所说的 Aporia,即决策时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每个决策都不同于先前的预判或期待,每个决策都打破原来的预测而有新的涌现;

(7) 相信语言和思想在建构自己客体过程中自身的作用,而不是作者或读者或研究者的控制,从而使“真理”历史化,不再用传统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圭臬来约束文学研究。

这里最重要的是从“关系”向“关联”的转化。如果说此前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借助“关系”质询结果的原因,即因果关系,那么,算法分析的“关联”则不顾因果逻辑而专注于所输入数据(如词元、语义等因素) 的关联解释,无需理论思考和文化批判,无需深入的文化理解,也无需探讨意义生产的缘由。这被称为关联主义的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文学算法分析能够证实以往文学理论中已有的一些范畴之不可靠,如黑格尔的悲剧辩证冲突观未必具有普遍性;或通过对《哈姆雷特》和索福克勒斯悲剧的分析表明主要人物不必处处到场,扁平人物亦并非可有可无,从而证明福斯特的人物“圆型—扁平”说尚有未言之处;或通过提供大量细节排除以往批评中的印象式判断,如《红楼梦》中每一章回多变而不完全重复的人物关系,显示出比经典理解要复杂得多的社会关系,进而由文学的人物关系分析进入对语境的社会、历史、政治乃至经济的关联分析。此外,对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有我们对以往“阅读规模”(scales of reading) 的理解,即对“经典”的重新认识,当我们面对 20 万部作品而非 200 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以为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或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之所列就是我们面对的英国和西方“经典”呢? 而被遗忘或被遗漏的就不必是“伟大的”“经典”呢? 这一发现势必会导致我们未来的阅读规模、观察单位以及研究对象本身的巨大变化。

2 量化之不能为

当下人文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所直面的问题是:大数据,也即大语言模型(或大模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 如何深化我们对莎士比亚、福楼拜、《红楼梦》的分析和阐释,也就是从过往文学批评的视角、方法和理论的辖域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大的文本和现实视野。无论如何,数字人文以及文学之算法分析和量化研究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工具,是

数据提供和整合,其“成果”当为批判性文化和文学研究所用。当然,“数据库”建立之迅速,蜕变之快,常常在已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时就有新的问题涌现,我们所面对的是浮光掠影般的表、树、图,是经过向量分析、图像识别、实证处理等程序提供的大量数据和样本,包括语言特征、母题、样式(体裁)、词频、语义关联、言语行为等,而究其实,所“规则化”的不过是文本中已有的,人脑中或历史上的隐性知识却依然没有挖掘出来。因此,这一阶段所共存的一个问题是:数据人工提供,指令人工给予,“特征”人工提取,而对整个过程与结果的深层分析依然依赖文化和文学研究者的阅读经验和阐释能力。这就是机器所不能为而人所能为的地方。在此仅举两例。

《手册6》(Pamphlet 6)集中讨论了从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概念、通过某种形式的量化、再回到文学文本的“操作化”。这里涉及的“文学理论”是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安提戈涅》时提出的悲剧冲突发生在普遍伦理和家庭伦理两个层面的论断。莫莱蒂就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对话中的关键词加以量化研究,证明安提戈涅显然代表着自然的家庭伦理;但克瑞翁却未必代表黑格尔所认为的普遍精神伦理,而只代表国家,即纯粹行使权力的国家;因此说黑格尔把克瑞翁的国家意识夸大为普遍精神性。为了证实这次操作的正确性,他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考察了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各自在与其他人物的对话中使用的词,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在面对面对峙中,个别角色才能表现出伤感力,才能进入冲突,推动情节的实际发展。而操作化证明,就全剧整体而言,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间的冲突即伤感力并不在相互对峙中、而是在与别人的交互对白中得到了最具戏剧性的表达,如安提戈涅与妹妹的交谈、或她面对歌队并通过歌队面向观众的长篇演讲中,由此证明了黑格尔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莫莱蒂总结说:

从量化到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展示数字工具和档案前所未有的经验力量如何为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范畴(categories)提供独特的机会……操作化的确改变了、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概念的关系:它提高了我们的期待,把概念变成了魔咒(magic spells),这些魔咒能创造一整个经验数据的世界……一个理论驱动的(theory-driven)、数据丰富的(data-rich)研究项目已经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它依赖检验,在需要时扭曲文学研究的理论知识。(Moretti, 2013:9-11)

这里,莫莱蒂对数据和档案的依赖和信任清楚了,并确认黑格尔关于戏剧冲突的伦理判断是错误的;但这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他的量化分析虽然从剧情的形式上证明了黑格尔分析的错误,但是否也推翻了黑格尔“两善两恶”的辩证对立论?能否从文化批判的更大范围内证明这种伦理冲突的内在逻辑?何况莫莱蒂只指出了“错误”,但并未给出正确解决冲突的方法。比如,在世界文化史的范围内,可否用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亲亲相隐”说为安提戈涅埋葬兄长的家庭伦理辩护?或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拿以撒为上帝做燔祭的故事来为克瑞翁的国家伦理提供理由?这些问题看似牵强,但实则可

以进入对国家伦理与家庭伦理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深层理解。必须承认,莫莱蒂对这一矛盾冲突的概念操作化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毕竟仍然是基于数字工具和档案的一种表层阅读(浅读)。如果纳入世界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范围内思考(深读),或许能见出这一对所谓“辩证”伦理矛盾的底层逻辑。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用以表达家庭伦理的“亲亲相隐”说实际上有一个无法逾越的前提,那就是父或子所犯之过绝对不是针对皇帝或国家权力的。反过来说,作为“仁之本”的孝悌这一家庭伦理行为必须在不损害皇帝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上“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和“大义灭亲”之举。同样,在《旧约·创世纪》中,亚伯拉罕拿以撒做燔祭的故事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奉,其中也蕴含着“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体。克尔凯郭尔认为亚伯拉罕的行为在伦理层面上是谋杀,但在宗教信仰层面上却是履行对上帝的绝对义务,而且是孤独的个人行为,以信仰为最高职责。德里达则认为亚伯拉罕处于一种无法调和的两难境地:服从上帝就必须违背普遍伦理,而拒绝上帝就是背弃对神圣他者的责任。因此,亚伯拉罕面对的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绝境”(aporia)。最终,冲突并非是由对立的某一方解决的,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解决矛盾的是第三方——公羊。但无论如何,在“忠孝”的伦理语境中,安提戈涅或克瑞翁、古代中国的父与子或希伯来的亚伯拉罕,他们作为伦理主体都必须在绝境中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

另一个例子是莫莱蒂早期对18世纪英国小说标题由长变短的计算分析。他注意到18世纪英国小说的标题从由40~60个词组成的占一页篇幅的总结式标题缩减为1~3个词的短小标题。据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文学杂志开始刊登小说评论,使得总结式标题显得多余;二是小说生产数量增多,书店里的摆放只显示书脊,词数越多,字体越小,因而不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图书市场越大,书的标题就越短;三是以人名为书名的小说越来越多,在风格上由冠词+名词、冠词+形容词+名词或抽象名词的标题,逐渐演化为由一个词构成的标题(Moretti, 2013: 192)。此外,他还对小说标题与市场的关系、与小说风格的变化、小说标题体现的伦理观,以及语言上的语义策略进行了分析。令人赞叹的是,莫莱蒂对7000个英语小说标题的量化分析确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些信息和理解。如赵薇所总结的:“莫莱蒂对七千部英语小说标题的量化研究时,启用线性回归等更系统的手段,帮助他完成了对描述性统计的超越,从而唤醒了统计学自身的‘自反性’,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远读’效果。”(赵薇, 2022: 158)

然而,就文化批判而言,莫莱蒂的量化研究仍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或机器所不能为的地方。其中较为意味深长的是以女性命名的小说标题,如只有女主名的标题:*Emma* (Jane Austen)、*Belinda* (Maria Edgeworth);以不定冠词标识未知命运的标题:*A Girton Girl* (Annie Edwards)、*A Hard Woman* (Violet Hunt)、*A Daughter of Today* (Sara Jeannette Duncan);标有父姓的女主名的标题:*Jan Eyre* (Charlotte Brontë)、*Mary Barton* (Elizabeth Gaskell)。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小说都出自 19 世纪女性小说家之手笔,标题都是女性人物。前三部为女性人物的名,没有姓氏,后两部则名姓齐全。按莫莱蒂的解释,前者显示她们未婚,隶属于家庭私有空间,故小说情节必然涉及婚姻问题。后者则由于成长小说和工业小说的兴起,以及女主进入社会,其形象也发生了 180 度的转弯,地位与男性平等,故既名又姓。这是我们从量化分析中得到的启示。但是,如果沿此路线继续追踪,直到 20 世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问世。这部小说的标题既无女主之名,亦无女主之姓,而完全是“妇冠夫姓”。更耐人寻味的是,故事中她却多以 Clarissa 称之。这又令我们联想到 18 世纪英国小说家萨缪尔·理查逊的长篇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那么,二者间有何联系呢?与莫莱蒂对小说标题的量化分析又有何关系呢?

首先是从名到名姓再到“妇冠夫姓”这一变化。伍尔夫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也许没有把理查逊的女主考虑进去,但这两个标题所指的隐含意义却令我们想到伍尔夫不可能没有想到《克拉丽莎,或一位年轻女士的故事》。两部小说两个故事,一个讲未婚女性克拉丽莎的故事,另一个讲已婚的克拉丽莎变成达洛维夫人的故事,都关系到女主的婚姻状态,仿佛 18 世纪的一位独立女性穿越到 20 世纪而成为一位“妇冠夫姓”的贵妇人。理查逊似乎遵循流行传奇(romance)的传统而用女主的名字作小说标题,结果却写出彻底颠覆了那个传统的一部小说。故事结局并非幸福婚姻,或根本就没有婚姻;克拉丽莎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并不属于她所属社会阶级的某个平庸女孩,而是象征一位打破家庭和社会羁绊、为一种当时不可能的婚姻而抗争的女孩。她的抗争并不是为了家庭和父名,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纯洁、正直和身份。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似乎只记得她自己的名字克拉丽莎,而不是克拉丽莎·哈洛(Clariſſa Harlowe),父名被小说不可淹没的深意淹没了。

无论是否考虑到“克拉丽莎”这位女性,伍尔夫对小说标题的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然也不会最后把原定标题《时时刻刻》(*The Hours*)改为现用标题。作为阅历深广的知名作家,伍尔夫熟悉英国女性婚后冠以夫姓的文化传统,熟知《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 Henry Fielding)、《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Laurence Sterne)和《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Charles Dickens)等出自男性小说家、以男主姓名为标题、描写男主的小说;也熟知描写女主、以女主名字为标题的小说《帕梅拉》(*Pamela*, Samuel Richardson)、《罗慕拉》(*Romola*, George Eliot)以及前述《艾玛》(*Emma*, Jane Austen)和《贝琳达》(*Belinda*, Mary Russell Mitford),以及《简·爱》和《玛丽·巴顿》等以父姓己名为标题的小说。姓名的象征意义在于,未婚男主无论有何道德缺陷,它都代表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完整,而未婚女主无论道德多么完美,都意味着她必然要与一个丈夫结合,因此,以无父姓之名作标题就是合理的,与男主不同,女主的父姓是借来的,终究要还的,也可以说,父名对于女性来说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伍尔夫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达洛维夫人》,就

是要昭示她虽然讲的是达洛维夫人的故事,一位已婚但并非挚爱丈夫的夫人的故事,但故事中她却潜移默化地成为理查逊笔下的克拉丽莎,表明婚姻非但不圆满,且不是生命的结局。克拉丽莎·达洛维这个名字并不代表一个稳定的身份,反倒是她非存在感的标志。

3 语言的边界

斯坦福及其他欧美大学的文学实验室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当下智能深度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算力(GPU 机器计算能力)指数增长迅速,造成了数据(文本、图像、代码、视频等)前所未有的巨量积累,这将促进算法的改进,以便高效地在海量数据中学习。对于文学算法来说,这依然是利用大数据(大语言数据)将无形变有形,不可视变可视,由量变到质变,实现文学算法分析的深度学习。但如何实现这种深度学习,目前依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则、方法和结论。在《量化的文学》(2016)中,莫莱蒂似乎对《手册》作了简要总结,提到了一些相关问题。他列举了2010—2016年实验室完成的几个项目,其中每一个团队都要发挥两种功能:团体单一机制的功能和团体中个体的特殊功能。每个项目都要经历两个不同阶段:首先是编程,由计算机技术娴熟和数学知识丰厚的专业人才完成;其次是精选语料、文献审查、结果分析、后续实验设计。这个阶段的独特之处是团体合作,是传统上任何单兵作战的学者所无法做到的。接着便是对这一阶段的调查结果进行整合,各个成员凭各自兴趣和理解提出不同见解:从语言、语法、语义、历史、进化论等范畴加以解释,最终对研究客体形成并非“由一双眼睛所能看到的”对客体的看法,从四个独特且又同等的层面展开:形象、说明性文字、文本和注释。

形象是把经验视觉化,即前述“无形变有形,不可视变可视”的过程,包括时序表(time plots)、直方图(histograms)、树图、网状图(networks)、散布图(scatterplots)等。这些图表实际上就是量化研究的对象,也是“远读”所面对的“文本”。就复杂性而言,对这种“文本”的“远读”不亚于传统上对一首诗、一个故事、一部小说的“细读”,只不过关注点不同,具体方法不同。首先要选择量化分析的对象,如“细读”也要选择一部作品或一段文字或一个句子或一个短语;其次要提供说明性文字,如同电影放映时提供“字幕”,告诉研究者(观众)这些图表(影像)都包含着什么。接下来是文本主体,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它需要一个立论把上述四个层面严谨鲜明地串联起来,构成叙事和理论,把一系列不相关的碎片织入一个概念网格(conceptual grid)。最后是注释,当然,这与传统“细读”一样需有大量的参考书,需从中作出选择,需要作出自己的解释,需要提出未来研究的预想(Moretti, 2016:3)。

客观地说,不成功的研究并非就不是研究,也不应受到打击与诽谤。或者说,与大部分“证伪”的实验科学一样,文学的量化实验基本上缺乏理想的深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改变思维方式和习惯做法,另辟蹊径,变失败为成功之母。而最重要的,是在失败或成功的实验中,他们总能看到“概念与量化的相遇”(encounter

between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进而想到“一个系列的量化单位是怎样进入与概念的对话之中、进而逐渐改造了概念的”。在这方面,实验室的研究业已涉及几乎一整个形式主义传统,按莫莱蒂的说法,这个传统所涉及的形态学、样式、语域、系统和风格最接近实验室的量化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了能够改造其概念乃至其知识体系的潜能。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从自然科学认识论(如遗传学、数学、物理学、熵理论)中汲取灵感,所需要的是从自然客体到文学客体、从概念到算法的双重转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莫莱蒂所提出的“三角定位”(triangulations):冈圭朗的型—元比(Type-Token Ratio)、克瓦雷的网络统计学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文学和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出乎意料的是布尔迪厄在三角定位中的出现(Moretti,2016:6)。莫莱蒂并未给出具体清晰的解释,但他认为这就是事物的实际状态,或许,这就是我们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该作出选择的地方。

赵薇在《中国文学数字人文发展报告》中说:“计算批评承认解释的主观性、先在性、复杂性和天然难度,它强调建模在思考和推理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数据—模型—细读—理论—数据’的阐释循环中,文学研究者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细读体验出发,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论证问题,与数据驱动的结果直接对话,达到破除算法黑箱、发现文本背后的生产逻辑的目的,使‘人’的维度在数字时代重放异彩。”(赵薇,2024:225)这番总结全面实在,道出目前文学算法研究之本真状态。从莫莱蒂三角关系中布尔迪厄的出现,到赵薇“文学研究者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细读体验出发……与数据驱动的结果直接对话”,我们看到的是摆在人文工作者或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条可选之路,致使“人”再度发挥“人”的能动性,即如何高效地实现人机合作,在算法分析提供的信息之上继续深入探索,即使是当下预测的未来“智能体”(Agent)的发展,也毕竟是由作为主体的人负责策略和判断、作为机器的智能体负责行动的一个存在,而不是能够完全取代人工的一种独立作业的非人类主体。

布尔迪厄的出现显然是由他提出的“场域”说所致。所谓“场域”无非是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或构型,也可以说“场域”就是“关联”,这正是算法分析的关键所在。“场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有疆界的区域,也不是传统界定的有自身边界的领域,而是有生命力的、具有跨界潜力的存在,如布尔迪厄所研究的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乃至文学场域。每一个场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都形成了伴随其发展而来的惯习,因此每一个场域又都是一个双重存在:场域与惯习。行为者(agent)首先接受场域的形塑和制约,但随着认知的增进,行为者反过来会对场域进行建构,又由于场域中每一个个体的惯习和认知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同个体对场域的认知建构也是不同的,彼此间也会产生“建构”和“生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场域的边界是由场域内个体间的互动来界定的,按布尔迪厄自己的说法,这个边界就是场域停止其作用的地方。从“发展”“建构”“生成”的视角来看,这个地方既存在又不存在:在场域的语境内它是存在的,而超越了场域的语境它便不存在了,因为那是它自身语言的边界。这毋宁说是对维特

根斯坦语言之边界说的另一种解释。维特根斯坦(1996)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Die Grenzen meiner Sprache bedeuten die Grenzen meiner Welt)。”世界的边界之所以是边界,是因为人的经验和语言无法表达这个边界之外的内容,因此它也是思想的边界。无法通过逻辑思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对于主体而言并不存在;凡是存在的,必须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一看似“唯心”的解释在唯物主义的年代里被忽视,现在却被智能体技术专家们视为真谛,因为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智能体(Agent)软件工程所处的语境或曰困境。

智能体所栖身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所涉及的业务也不是业务全貌,而是被接口、类型、权限、日志和反馈机制重组过的世界,因此其有效语言也不是真正的自然语言,而是无数次被机器读取、约束、检验和追责的语言。自然语言在这个世界里虽然不可或缺,但却是最软弱无力的,未经结构化的,给出的指令或提示往往也徒劳无功,毫无约束力,经常受到大模型认知的改造或忽略,或无意中贬损或扭曲专家高维意图的思维和判断,致使大量的隐性关系被压缩或埋没。如何使可能被压缩或埋没的隐性知识外化?当上下文不再是智能体纵览的代码库时,当智能体只关注某个窗口或摘要时,它所栖身的就不是系统本身,而不过是系统的一个即时片段,因此会滋生幻觉(hallucinations)。此时的智能工程师已经不是“语法学家”,而是判定边界的“法官”:智能体是否僭越了系统限定的界限?哪些深层思考该沉淀为机器无法逾越的物理结构?自然语言的作用是否在机器的“黑箱”或幻觉中停止?机器的理解极限是否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极限?这些都是智能体专家们亟待回答的问题。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1996:133)这给人的一个警示是:当我们试图用自然语言表达那些“不可说”之物时,收获注定是失控或幻觉。当我们面对类型、权限、测试、代码、架构、向量、负向等严格的约束体系时,我们是否已经到达自然语言的边界,因而保持沉默?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语言的边界,并在这个边界之内为机器语言构筑属于它们自己的边界。

按此逻辑,如果我们把数字人文和文学算法分析中任何一个表图都看作一个场域,进而把这个场域看作文学文本的世界,因而也是用以表达这个文本世界的语言的边界,那么,表图上的任何一个点、一条线,或点线的群聚(clustering)就都是场域内个体间的互动或力量的集聚,并反映行为者所内化的行为倾向、感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这些实际上就是算法分析使之可见(可视化)的形象表图所隐含的内容,也是算法阐释环境中检视已见(seen)与未见(unseen)因素的条件。当然,在面对“不可说”之物时,我们不必非得保持“沉默”:一旦走出自然语言的限域,超越自然语言而进入机器语言的“场域”,“不可说”或许就变成“可说”的了。既然数字人文和文学算法分析已然(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可见”变为“可见”,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那么,如何通过可视化将“不可说”变成“可说”、将“沉默”变成

“言说”，再通过数据来阐述文本内外隐匿的文化意义，就是数字时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或可选的主题。

4 批判性阅读

以上我们概述了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文学算法分析(主要以斯坦福文学实验室为例)的发展,顺便论及对近三年来发展中的智能体的预测。然而,对于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而言,数字人文和算法分析依然是陌生的,如欲参与,就必须潜心面对,就必须将其视作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20 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诸多文学批评方法(统称为批评理论)都是应二战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需而涌现的文化思潮,其最基本的立场是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而衍生适应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批评视角。当下数字人文和文学算法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为摈弃 20 世纪末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僵化陈腐,基本前提也是打破二元对立,因此是应数智时代之新需要而出现的,并不是某学者某学派的匠心独具或别出心裁,更不纯粹是数字科学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暂且不能、也没有理由将数字人文及其项下的文学算法分析视作一个独立学科,而应将其视作符合数智时代需要的一种批评方法,如前此的现实主义批评、历史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等,或更远一点看,是在量子—硅基时代到来之前出现的文化征兆,绝不能视其为等闲,必须观察其发展,弄清其路数,尽量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场域)中来,否则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会使用计算分析的基本方法,以掌握如何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耕细作。

在这方面,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远读与细读究竟是什么关系?量的研究方法与质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这两个问题又可引申为:“语料库与源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量化模型的描述属于这些关系的哪些方面?”(Gavin, 2022:177)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充其量说明矩阵中各个点之间的关联,其意义是否完整、发现从何而来、计算依据什么、反映了文本的哪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历史社会实践的关系如何等。迈克尔·加文(Michael Gavin)在《文学的数学:文本研究之量化理论》中提出了他的“远读假设”(distant reading hypothesis),以深化他所谓“文学的数学”的量化文学分析。从定义上说,“文学的数学”不外乎是用以解决文学问题的数学,用描述文学之可数特征的形式表达再现批评概念,“远读的目标就是让计算服务于文学史,数学模型成为评价和描写历史变体的工具”(Gavin, 2022:177)。

这实际上也是基于文本的文化分析,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曾于 2020 年发表专著讨论过此问题。马诺维奇认为,传统人文学科注重细读,即对单一文学文本的深度解读,这显然跟不上数字时代文学的海量生产,因而提倡以远读方式对海量文化数据进行宏观分析,以发现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模式、趋势与结构。他为此提出五个基本观点。第一,文化分析是用计算和设计方法探讨和分析当代的文化规模,包括数据可视化、媒体—互动

设计、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等方法;目的是看到数以亿万计的人每天的创造、想象和价值,以展示人们对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民主理解。第二,人类进化语言已不足以捕捉人类感知和文化经验的模拟属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数据科学满足了这一需求,数(numbers)和可视化就是能再现时间之逐渐和连续变化的一种语言。第三,人文学研究始终偏重文学文本、历史记录和空间数据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静态与运动影像和互动媒体等的研究,这也是他此书研究的重点。第四,通过观察巨量的文化数据集和流程来提供新的界面和技术,避免使用语言强加于现实之上的范畴、量化、测量和总结。他认为人类能够发现更多的意义维度,识别至关重要的小细节,并将信息传到远比计算程序更多的语境之中。他还认为在不确定的未来,人类自身的主导能力依然是真实的。第五,文化分析不仅要利用当下流行的计算方法,还要对这些数据科学方法和假设加以批评检验,这已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数字人文、数字文化研究、算法批评、数据研究和软件研究等领域中初见端倪。显然,他鼓励对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批评检验,始终不忘人自身的能动性(Manovich, 2020: 13-16)。

总起来看,这五个基本观点中肯客观,没有偏颇,且简明易懂,令文学研究者感到遗憾的是,他所研究的重点不是文学,而是影像传媒,尽管我们仍能从中旁悟出与文学相关的意蕴,对数字人文和文学算法分析均有借鉴意义。对比而言,与文学更为相关的当然是前面提到的加文的“远读假设”,类似于一种“数据库对应理论”。加文特别提到莫莱蒂在提出“远读”说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因此有必要予以说明。加文认为,基于文本的文化分析是观察数据与数据外之“物”(things)之间的对应。这些“物”可能就是源文本,但也可能是探索者所意指的文化的“过去”。作为“远读”的基本前提,加文提出:“如果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文献,如果文献被保存、抄录、集入一个语料库,那么语料库中的变体(variation)也将在意义上对应于那种实践中的差异。”(Gavin, 2022:178)语料库中的变体与实践中的差异相对应,这无异于说实践中的差异在语料库中得到了再现,但没有说语料数据是否反映了过去的客观真实,没有说语料库能否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现实,更没有说语料库何以让我们了解过去。他认为这相似于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情景语境”,即“正在写的东西中的差异对应于已经写过的东西中的变体”(Gavin, 2022:179),也可以解释为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情景因素与文本中变体的对应。这里的关键在于变体能否如实地反映历史现实。

在对变体进行详尽分析之前,加文提出五个基本假设(Gavin, 2022:180),综合起来可表明两种情况:第一,源文本一方面应与其原语境相符,另一方面也应与语料库相符;第二,源文本中会出现一些非正常因素以及抄录或分类错误,这也会在数据中体现出来。在第一种情况下,数据能够正确呈现分析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数据反映的“过去”是有误差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基于数据的历史研究中,“过去”指先于文本存在的现实,这是研究的基本动机,也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但在实际发生的量化分析中,“过去”只存在于数据库之内,是组织文献的结构原则,也是根据元数据来整理文献的观念结构,因而就如

同柏拉图关于“模仿的模仿”的理念一样,与“过去”所指的历史真实是相隔的,即构成数据库的文献以及描述这些数据库的元数据。如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元批评”(metacriticism)一样,元数据(metadata)也被定义为描述数据的数据,是提供有关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描述性信息,如识别、描述、评价、追踪数据资源,以便有效地发现、理解、组织和管理数据资源。这些描述均与真实世界(“过去”的过去)具有血缘关系,因此在结构、特征、关系和管理等方面必须具备准确性和可用性。但在把文献组织成数据集的过程中,研究者常常发现或刻意寻找数据转化过程中发生的变体,即根据不同属性进行不同分类时产生的差异和不同时空不同位置 and 不同关系的“分布”(distributions)。

在文学算法分析中,这种变体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语料库集群的特征持续与元数据中价值相符,那么,这些集群就暗示其所指的过去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否则便不是真实的,因此也就没有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识别变体也就是识别新的拓扑结构,以展示文化记录的不同方面。这正是文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文学文本在时间中的存在,人与词(“物与词”)的关系如何,以及在明显的历史断续中存在的历史连续性。质言之,人书写其对物之所想和所感,因此,物以及对物的所想和所感不可能不在历史中留下踪迹,也不可能不反映一些重要的历史现实。这就是“远读假设”的基本内核。从马诺维奇的“文化分析”到加文的“远读假设”,从前者的五个基本观点到后者的五个基本假设,我们看到的无非是人文学的一个简单证明,即文化文本和文学文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包括数据形式),都必然留下历史的印迹。发现和评价这些历史印记的途径,即使在不远的大数据年代,也依然是阅读。而阅读,无论远读或细读,深读或浅读,或任何其他读法,如道布森在《批评数字人文》一书中引用德里达的话所说,总是要以某种路径通过某一文本来完成的。某一路径可能是特定情景决定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也可能是历史决定的。然而,“只要路径的总体没有枯竭,我们怎能只认定这一条呢?”(Dobson, 2019:47)道布森认为这是人文学的核心:如果真有一种人文学研究的方法,那一定是无休止地追问这个问题的一种元方法(metamethod)。在数字人文领域,算法阅读是以对硬件、软件、社会基础结构和方法史的批评检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日益更新,迭代迅速,很难用于人文研究,这是事实。但人文学者也不能由于其更新迭代而无限期地迟疑观望,无视数字时代推出的新方法。道布森为此提出第三条路径,即把批评理论与算法分析相结合的路径,称作批评数字人文(critical digital humanities)。这一方法的提出依然依据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量化研究和算法分析已经为人文和文学研究提出诸多洞见和新论;另一方面,对数字或数字化资源的阅读和阐释依然要依靠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方法,也就是批判性阅读(Dobson, 2019:10)。

5 结语

人文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当下必须做的,就是学习和利用机器所能为,包括现有的数据

库、语料库,甚至元数据、大数据,将其作为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资源,学习数字人文和算法分析等新方法,进而发挥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者的传统优势,即细读或历史主义阅读的功底,创机器所能为之新,守人类自身能力之正。在我们言说的语言的边界,不仅视以前所未视,还要言以前所未言,见以前所未见。虽然文学的量化研究仍未有独立的理论和成熟的方法体系,但就目前发展的态势看,远读、宏观分析、机助批评和基于数据结果的文化分析等已初具规模。但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仍需要寻求一种思维转向,即如何在人文学科内的本体论层面消除对算法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的态度接近算法,同时充分发挥现有阅读和阐释方法的价值,从以前单维度的文本解释转向多维度的人文阐释,或调用现存批评理论资源检验算法研究的可靠性。而最重要的是批判意识,尤其在面对未经充分理论化的建构、工具和概念的时候,在不落入实证主义窠臼的同时,重现文化批判的活力。如此,我们或许能在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与伍尔夫的克拉丽莎这漫长的文化史变迁中看到久被语言、历史、文化所深埋的东西。

参考文献:

-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 1996.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薇. 2024. 中国文学数字人文发展报告[G]//冯慧玲. 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第1辑. 北京:中华书局.
- 赵薇. 2022. 作为计算批评的数字人文[J]. 中国文学批评(2):157-166.
- Dobson, James E. 2019. *Critical Digital Humanities: The Search for a Methodology* [M].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avin, Michael. 2022. *Literary Mathematics: Quantitative Theory for Textual Studies*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 Manovich, Lev. 2020. *Cultural Analytics* [M]. The MIT Press.
- Moretti, Franco. 2013. *Distant Reading* [M]. London: Verso Books.
- Moretti, Franco. 2013. “Operationalizing”: or, 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G] // *Pamphlet 6, Pamphlets of 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 ISSN 2164-1757 (online version).
- Moretti, Franco. 2016. Literature, Measured [G] // *Pamphlet 12, Pamphlets of 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 ISSN 2164-1757 (online versio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Age

CHEN Yongguo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age is both a “distant reading” based 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nd a textual “close reading” of traditional formalism, and both a “surface reading” relying on collection of big data and a “depth reading” conducted by the cognitive and analytic ability of the subject. The experiments of Franco Moretti and his Literary Lab have paved a way for quantit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t, and yet received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relied too much on algorithms and lacked a perfect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new techniq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owerful insight of Human Intelligenc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a critical reading of literature on the border of

natural language, making the best use of all these techniques of reading, and integrating a computational reading that will do what the machine can do on the one hand, and a traditional human research that will do what the machine can not do on the other.

Key words: quantitative studies; computational analysis; critical reading

责任编辑:冯革

第八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高层论坛(2026)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实践、发出中国声音,推动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研究》《外国语文》《中外交流研究》编辑部拟定于2026年11月13日—15日在南京召开“第八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高层论坛(2026)”。本次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

主要议题包括:

- (1) 中国外语界面研究的理论自觉:从借鉴西方到建构本土范式
- (2) 中华典籍与思想的外译、诠释与话语体系自主化路径
- (3) 中国外语教育实践中的知识生产:课程、教材与教法的本土化创新
- (4) 跨文化界面中的文明互鉴与主体性建构:外语学科的回应之道
- (5) 数字人文与外语界面研究:中华文化数字资源的整合与知识体系生成
- (6)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外语研究:中国应用场景与技术-人文协同路径
- (7) 面向时代之问的界面方法论:混合研究、案例积累与自主学术逻辑
- (8) 外语学术话语中的中国概念:术语翻译、学术命名与国际影响力
- (9) 比较文明视角下的外语界面知识整合:超越“中西二分”的创新路径
- (10) 国家战略需求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与评价支撑

联系人:宋老师 13645167935;谭老师 15902365577